

我心目中的鈴木陽一先生

廖 可 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與日本學者的交往不算多，主要是因為沒有在日本任教或訪學的經歷，也沒有與日本學者合作進行課題研究。鈴木陽一先生應該是我交往最深的日本學者，但相聚交流的機會也很有限。不過，就在這些有限的交往中，鈴木陽一先生的細心、正直、熱忱、認真，已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由衷敬佩。

1993 年至 1994 年間，鈴木陽一先生曾來杭州大學中文系訪學，問學於著名古代戲曲小說研究專家徐朔方先生。徐先生是我讀博士時的導師，但我已於 1989 年年底畢業，留系任教。鈴木先生參與徐先生組織的研究生教學活動，我大都未能參加。但後來鈴木先生回憶陪徐先生在杭州大學附近的寶石山、黃龍洞等地散步交談的情形，我讀到後深有會心。因為這樣的情形我自己經歷過。我 1987 年初進入杭州大學讀書，徐先生經常天不亮就到我住的宿舍樓下叫我，讓我和他一起去爬山，路上隨意談話，有時候徐先生會就一個問題不斷追問，我不免感到緊張。有時我問徐先生某個問題，他也可能乾脆地回答：我不知道！這似乎是沒有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但徐先生以身作則，告訴學生應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實際上是對學生的一種重要的教育。

我記得當時曾參加杭州大學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學者王勇教授組織的與鈴木先生共聚的活動，鈴木先生總是笑咪咪地望著大家，偶爾說話，語速很快，表情豐富。我們得知他當時正在從事杭州地域文化與中國古代通俗小說、戲曲和說唱文學關係的研究，對杭州地理風光和生活習俗的一些細

節特別感興趣，如杭州西湖有座所謂長橋，實際上並不長，好像不過數米，鈴木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並談到《白蛇傳》等通俗文學中對它的描寫。處於不同文化體系中的人，對另一個文化體系中的某些特點，可能特別敏感，或旁觀者清，或別出新解，往往使屬於這個文化體系的人眼睛為之一亮。鈴木陽一先生當時的見解，使我很受啟發，同時也讓我初步感受到日本學者嚴謹細緻的學風。最近我發現，鈴木陽一先生將他的電子郵件地址改成了“leifengxizhao”，即用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作為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可見他對杭州及西湖的深切留戀。

大約在 1999 年前後，我和王勇教授等訪問日本幾所大學，在神奈川大學受到鈴木陽一教授的熱情接待。這次會面中，鈴木陽一先生說的一段話令我受到強烈震撼，我對鈴木陽一先生的認識發生質的飛躍。他說，日本的很多中小學每學期舉行開學儀式時，要演奏《君之代》，在場者需起立致敬。鈴木陽一先生認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軍人侵略亞洲各國時唱的歌曲，因此他作為家長參加這種儀式時不肯起立。據他說，原來持同樣看法而不起立的人還比較多，後來起立的人慢慢地就越來越多了，不起立的人承受的壓力就越來越大了。近年來，各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我不知道情況發展如何。鈴木陽一先生當時所說的這段話，讓我看到了一個有正義感、有良心的日本學者的形象，讓我知道很多日本朋友是真正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後來我在多個場合中提到鈴木陽一先生的這段話。

2001 年 10 月，我與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的同事們一起主辦了“慶祝徐朔方教授從事教學科研五十五周年暨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任浙江大學負責人張浚生先生、復旦大學章培恒先生、南京大學吳新雷先生等海內外數十位專家學者與會，暢談徐朔方先生對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研究和明代文學研究的傑出貢獻。會後安排遊覽西湖周邊風景，徐先生在宴會上應大家的請求唱了昆曲，與會者都非常愉快。鈴木陽一先生應邀專程前來出席，可見他篤於師生情誼。開幕式上，鈴木陽一先生作為海外學者代表發言，他對陪徐

先生散步的回憶，就是在這次發言中說的。他的發言和提交的論文，都收入了《奎壁之光——慶祝徐朔方（步奎）教授從事教學科研五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6 月出版）。

我於 2009 年 9 月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王勇教授也應邀來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學。不久鈴木陽一教授即來北京大學，與老朋友相聚。那時他好像已擔任神奈川大學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的負責人，非常希望推進神奈川大學與北京大學等中國大學的合作，積極、真誠的情誼溢於言表，我們受到強烈感染，曾向有關負責人報告此事，並受命草擬過合作交流的協議。2014 年 3 月至 4 月，鈴木陽一先生到上海復旦大學訪學一月，期間順訪北京大學。4 月 3 日，我和潘建國教授請他在中文系做了“江戶時代的日中文化交流”的學術報告。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還是推進神奈川大學與北京大學的交流合作，我們介紹他與中文系領導見面溝通。當時距釣魚島事件發生不久，中日關係陷入低谷。他認為，越是在這種時候，中日兩國人民之間就越需要加強交流。他研究的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他希望能為當代中日文化交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對此有非常堅定的認識，也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鈴木陽一先生曾任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的會長。2016 年 9 月，在該學會成立三十周年之際，他在神奈川大學主辦了“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日、韓等國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諸多著名學者如黃霖、孫遜、大塚秀高、金文京等都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日程緊湊，討論活躍，內容豐富，還正式出版了論文集。鈴木陽一先生為表達對朋友們的友情，安排來自中國的學者會後去箱根蘆之湖景區遊覽，住在神奈川大學的療養培訓基地，自費請大家吃海鮮大餐，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目。為使會議順利舉行，鈴木陽一教授竭盡心力。我本來因為有事，準備只參會，不旅遊。鈴木先生既不好勉強我，又為我失去這次機會而感到惋惜。我現在重讀當時我們為此所發的郵件，往返達十幾封，我後來決定參加旅遊，避免了因錯失一次欣賞美景、瞭解日本歷史文化、與老朋友們親密聚會的難

得機會而造成的遺憾。我既為自己的猶豫不決給鈴木陽一先生造成太多麻煩深感愧疚，也充分體會到他對朋友誠摯的情誼。

2016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學劉玉才教授的協助下，邀請鈴木陽一教授來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和海外漢學家研修基地訪問一個月。2016年9月14日，鈴木陽一先生來到北京大學，26日做了“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系列學術演講”的第69講“江戶時代過海傳來的中國文化——日中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應中國人民大學谷曙光教授的邀請，鈴木陽一教授還去該校做了演講。與鈴木陽一先生的這次相聚，使我看到了他的性格的另一個側面，即認真、坦率。當時，因為有關手續要上報國家漢語推廣辦公室，程序比較繁瑣，直到距鈴木陽一先生10月18日離開北京只剩幾天了，有些手續還沒有辦妥，他給我打過幾次電話，非常生氣。我理解他的焦慮，但也知道有關部門辦事的作風和效率，為此感到十分慚愧。好在後來事情圓滿解決了。

2018年12月，神奈川大學漢語系成立三十周年，鈴木先生囑我以個人名義發一段賀辭，我寫的是：

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上說，中國和日本都應該加強相互的瞭解、交流與合作。三十年來，神奈川大學漢語系為此作出了積極貢獻，謹表示衷心的敬佩和祝賀！願神奈川大學漢語系日益興盛，為迎來中日相互瞭解、交流與合作的新的春天增添光明和熱量。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廖可斌拜賀

2018年12月9日

我寫的這段話，既是一種禮節性的祝賀，也表達了我的真實心願。我的這種想法，既來自於對中日文化交流歷史和中日關係現狀的感受，也來自於多年來與鈴木陽一先生交往中所受的啟迪。

如今欣逢鈴木陽一先生年屆古稀，退職榮休，我也年過花甲，彼此老景相似，老懷相通。我衷心祝願鈴木陽一先生好好修養一下他那並不十分強壯

而多年來超負荷運轉的身體，健康快樂，老朋友還能多有相聚的機會。同時，我也希望，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像鈴木陽一先生這樣正直、真誠、善良、熱情的人越來越多，越多越好，這樣中日關係才有可能變好，這個世界才可能越來越好。